

《西北历史研究》专号 1990~1991年合刊

马长寿纪念文集

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

● 王宗维 周伟洲 编

●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北历史研究》专号

1990~1991年合刊

马长寿纪念文集

——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

王宗维 周伟洲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011号

马长寿纪念文集

王宗维 周伟洲 编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印张: 12.75 字数: 331千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7-5604-0427-8/K·76

定价: 9.50元



马长寿 教授



纪念马长寿教授学术讨论会



青年时代的马长寿教授



马长寿教授与夫人陶延梅

目 录

- 怀念马长寿先生…………… 张岂之 (1)
- 深切怀念民族史学家马长寿教授… 林耀华 陈永龄 (3)
- 深切怀念马松龄老师…………… 石兴邦 (5)
- 求实求真的科学开拓者…………… 彭树智 (13)
- 论马长寿先生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
中的杰出成就…………… 林 幹 (20)
- 马长寿先生对中国西南民族
研究的贡献…………… 李绍明 冯 敏 (36)
- 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 周伟洲 (56)
- 马长寿先生传略…………… 王宗维 (65)
- 我国历史上周边地区人口变迁蠡测…………… 史念海 (85)
- 先秦时期的中华民族…………… 尤 中 (117)
- 略论黄帝及五帝系统的形成…………… 斯维至 (149)
- 商代前期的民族关系与商都五迁…………… 段连勤 (163)
-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 陈全方 (196)
- 西周金文中的猷国…………… 尚志儒 (209)
- 试论四川西部地区石板墓的葬俗和族属…………… 刘士莪 (219)
- 汉代属国制度探源…………… 王宗维 (230)
- 甘肃正宁出土的北周造像题铭考释…………… 周伟洲 (253)
- 魏氏高昌王国各民族的文化及其相互交流… 王 欣 (271)
- 突厥即铁勒考…………… 杨圣敏 (291)

辟所谓“西藏种族论”并驳斥经史内 所流传的藏族起源于印度之谬论	马松龄	(294)
西藏日喀则那塘寺调查记	宿白	(308)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	王尧	(331)
评范普拉赫就西藏签约问题上的 “西藏独立”说	洛桑	(344)
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 的研究	杨铭	(363)
史前考古学与民族学	魏京武	(387)
编后记		(399)



怀念马长寿先生

张 岂 之

著名民族史学家、社会学家马长寿教授离我们而去已整整20年。

马长寿教授于1955年9月从上海复旦大学调来西北大学。不久即担任西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兼考古教研组主任，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和西北民族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长寿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著作，如《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南诏国内的部落组成和奴隶制度》、《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彝族古代史》等，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为西北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马长寿先生的研究工作，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之考订，而且重视实地调查。他写的论文《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嘉戎民族社会史》（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辑）、《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辑）、《凉山罗夷族的族谱》（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辑）等等，都是长期从事社会调查而作出的学术成果。他写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约百余万字。他到西安后，又和他的学生从事陕西回民起义的调查，所写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资料，约40万字，内容丰富。早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马先生先后在四川大小凉山、大小金川、甘孜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民族历史文物、社会习俗、语言等资料，受到学术界

的重视。

马先生在西北大学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他爱护青年，对学生从政治、人品和学术都加以严格要求。他培养的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为教授、研究员，在西北民族史的研究领域继承老师的遗志，作着辛勤的耕耘。

1955年马先生刚调到西北大学时，我是一位青年教师，当时马先生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学者，我经常向他请教，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和我交谈。马先生高尚的文德至今使我们受到教育。我们永远怀念他。

深切怀念民族史学家马长寿教授

林耀华 陈永龄

我国著名的民族史学家马长寿教授逝世已20年。每当我们从事民族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及有关的学术活动时，都会想到马长寿教授：“如果他仍健在，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解放后40多年，民族史学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有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谁能忘记，无论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史的拓荒时期以及此后二三十年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位博大精深、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学者，对民族史这块园地洒下了多少心血，我们谁都不会忘记他，我们谁都会怀念他。

我们二人有幸在40年代的成都华西坝和50年代的凉山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及昆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学术讨论会上结识了马长寿教授。我们都深为他能充分运用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语言调查和民族学实地调查等资料，紧密结合起来，探索民族史的堂奥所折服。他总是不为学术界常见的藩篱和界限所束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人说他有点“海派”，也就是说未能按照传统史学的规范来作学问，但他能突破传统的学术藩篱界限，采长补短，运用多学科的成就，去除跨学科的偏见，而对民族史这块园地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即使是一得之见），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我们应该多有些像马长寿教授那样的“海派”专家学者来协助我们打破传统相习的那些清规戒律，使我们能多学习其他跨学科的优长之处，刺激我们会更多地思考、运用姊妹学科的成果，来充实民族史这块瘠薄的园地。

我们也曾看到他在凉山艰苦紧张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进行实地调查，与少数民族群众同甘苦，细追溯彝族的族源和社会性质问题。我们也曾看到他在昆明的学术讨论会上，坦率陈词，热烈争论，既能坚持自信，又能虚心聆教，充分体现出他是位心胸开阔、严肃正直，而又不拘泥于书斋的学者。

我们也看到他带着自己的研究生，长途跋涉去四川凉山，也听说他们师生多次去西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以补文献之不足。他勤勤恳恳，对研究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他培养起来的几位研究生现在都已出类拔萃，在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的领域内成为佼佼者的骨干。马长寿教授多年培育的果实是丰硕的，这就完全可以告慰于马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马长寿教授，我们深深地怀念你，我们深信：你在民族史园地中所抛洒的心血，所浇灌培育的种籽，还会继续开花结果，继续得到丰饶的报偿。

1991年4月于中央民族学院

深切怀念马松龄老师

石 兴 邦

今天是马松龄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他85诞辰的纪念，在这值得纪念而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引起了我对往事的无限感怀和追思。

马先生是我们深切怀念和崇敬的先辈，他的道德、文章和学术上的贡献，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一宗财富，是值得我们珍惜、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我私教于马先生门下，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在大学时，我学的是人类学和民族学，我读了他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亲浴教益是从解放前夕，南京的“应变”时期开始的。时间在1949年初。1948年秋冬，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中央大学一部分教师和学生随之南迁广州，后转台湾。当时我们系里（边政系）的教授多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诸先生担任。他们也多迁至台湾。未南迁的教师，也因时局紧张，返回四川、湖南故乡了。1949年春，学校在“应变会”的主持下，逐渐恢复正常秩序，开始复课。当时我是准备留校当助教的，系主任韩儒林先生命我协助办理系务。当时马先生任教于金陵大学，没有迁移。韩先生让我去请马先生、徐益棠先生和中央研究院的马学良先生来为中大同学上课，诸前辈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校授课。1949年3月开学后，马先生讲授凌纯声、芮逸夫先生的边政制度、边疆民族史和民族学调查方法；徐益棠先生讲授衡惠林先生的民族志（中国部分）；马学良先生接董同龢先生的语言学。当时全国设边政系的只有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中大的边政系实际是民族学系，除

一般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外，主要学习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大边政系共分蒙古、维吾尔和西藏文史三个组，而任教的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

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前途未卜，当时马先生和徐先生都想到中大来任教，韩儒林先生也同意请他们来。但在解放后，由于将边政系和社会系都取消，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

1949年秋，我考到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当研究生。马先生想到浙大人类学系教文化人类学课程，当时系主任吴定良先生同意他来，那时人类学系请了几位著名的教授：夏鼐和刚从美国回国的吴汝康先生和夫人。

到浙大后，先随吴定良先生学体质人类学，后因夏鼐先生讲授考古学和史前史，并受唯物主义史观和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影响，我改随夏鼐先生学考古学。1950年秋初，我已决定随夏鼐先生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马先生到浙大人类学系来了，他希望我留下一块研究民族学，学民族学对我来讲比考古学更熟悉，但已决定学考古，就离教去了北京。心中也确有戚戚之感！院系调整时，浙大人类学系并入复旦生物学系，他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50年代中期，支援西北时，马先生又到西北大学来，这时我在西安进行考古工作，我们又遇到一起，感到由衷的愉快和高兴。他当时热情很高，由于陕西地区的特殊历史地理背景，他自己的学术素养，他对考古工作十分热衷，我们经常接触论谈有关考古和民族学上的一些问题，直到他的逝世。

解放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以新的面貌出现，表现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炽热的追求和无限的忠诚，他对苏联民族学研究给予很大重视，尤其在理论、方向与方法方面特别注意，他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最有意义，而现在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尤其来西大后，表现得更加热忱。

他到西北大学后，对考古工作也很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提倡

考古事业和民族史、地方民族史问题的研究。这是由于：一方面出于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另一方面与他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素养有关。马先生在大学时期，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成绩很优异。他是李济先生挑选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之一，调到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后，他的品学和才华，很受李济先生器重，首先派他去凉山对彝族作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取得很大的收获。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30年代到40年代初，是考古人才集中的机构之一。当时李济任主任，与马先生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天木、夏鼐、曾昭炤和郭宝钧等先辈，当时都是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也是后来为中国考古学建立功勋而为我们所崇敬的前驱，马先生在这里也受到考古学的训练和熏陶。

我同马先生的接触和聆教中，深知他为学之道：

（1）很重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运用

他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他对当时世界上社会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所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十分熟悉，他能择其善者而用之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视野开阔，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也能将新的好的科学理论和观点渗透到里面去，即使古史传说之掠影，也能捕捉它的形体，像《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等一类文章，表现了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深远的见地。

解放后，他是一个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自己科研工作中的进步教授之一。他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者和拥护者。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新事物十分锐敏，热切地追求真理。给我们上第一课时，他说到调查研究、掌握方法的重要性时，特别提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学习马列主义。他说科学要发展，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科学的新方法，掌握发现研究事物的手段。他说，我们提倡用

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不是赶时髦；而在学习后，确实觉得对我们研究工作有帮助、启迪和指导性。而他自己这样说，也这样作，真正运用到自己的科研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解放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不论在史料的运用、史实的论述还是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基本是按上述原则和方法进行的。和以前同类著作相比是迥乎不同的。这也是他的论著能科学地揭示历史真谛和规律的原因所在。

（2）重视田野调查工作

民族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一样，田野工作是同等重要的，它是取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手段，与文献资料相较，或者还更重要些。他自己在实践中，也得到很大的启示和认识。

在他的经历中，重要的田野工作是李济先生在30年代派他去凉山调查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状况。当时研究彝族是一新的课题，中外人士都很热衷，都想解开彝族之谜：它的族源、独特的奴隶制度、人种特征、历千年而不变的历史社会等等。当时研究彝族著名的学者还有徐益棠等先辈。1949年秋，我考浙大人类学系研究生时，吴定良先生叫我作一篇论文，也是讲彝族问题。马先生的调查，是身履其境，用现代民族学方法调查，收获很大，很有价值，可惜这宗上百万字的资料尚未发表出来，如果能将遗稿整理出版，那将是极富有科学价值的一件事情。

马先生到陕西后，作了两件有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件是清代的“回民起义”调查，这件事在陕西人民（不论是回民、还是汉民）的记忆里都是痛苦的。他的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许多对事态发展和性质的新认识；他认为对这件事，无论从民族或阶级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局限性的，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和近代史甚至历史上许多民族问题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局限性。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帷幕的后面。只有揭开层层帷幕，才能现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会把他

研究所得的卓识灼见发表出来。第二件是调查关中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史迹遗存。这主要是分布在各地的碑碣刻石和各种文书方志。他认为这批资料，对研究关中地区古代民族关系史十分重要，既是民族、也是政治文化的融合和变迁的记录，很有价值，“宝藏到处有，只待人发掘”。他到陕西后，将这批宝藏发掘整理出来了，也是他对地方民族研究上的一大贡献。

他曾几次说过想和我们考古工作者到陕西重要遗址与民族史有关的地方去亲自看看，可惜时移世转，而未能实现。

马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尤其在民族学和中国民族史方面，有宏富的著述，他通古履今，对中国历史有深厚的根基，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志和民族史方面研究造诣尤深。不仅限于中文史籍，他借助金陵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丰富的外籍文库，涉猎有关中国和世界民族论述，他都尽可能地吸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著作中，注意运用现代科学社会学的先进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论述问题周衍，论衡得当，他不是从民族学一途去发现，而是融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诸因素汇于一局，形成论著，卓然成一家之言。因此，他在世时和他去世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一致推崇。

马先生在学术上的功绩，我个人提不出评论性的见解，因为我自学考古后，再没有多的时间和精力研讨民族学方面的问题了，尤其是具体课题的讨论上更是如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对我国狄羌系统的民族史作了最系统最完备的论述，把这一纷歧错离的民族历史，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在这方面的一系列专著或论文，不论是民族关系、社会制度、种族归属、发展演化及其兴衰复递的规律，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这是一个创造，在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民族史研究的朋友都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知道：在我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周

围，有两大历史民族文化体系：一个是东南沿海地区，以汉藏语族为主的夷僚（或夷越）文化体系，其中包括南岛语族的部落；一个是从东北—内蒙—西北到西南的狄羌系统的民族，这里面包括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伊兰语族各族。夷僚系统比较简单，他的发展特点是汉化的过程，没有形成对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历史上虽也建立过地区性的国家或政权，但没有形成足以和中原对抗的政治实体，彼此关系和发展轨迹也十分清楚。而狄羌系统则不同，情况异常复杂，从东北到西南这一曲尺形地带，外连中亚大草原，内通内蒙、新疆沙漠草原地带，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频繁地带，不论历史民族文化，还是考古文化都显示这一地带的特殊性，共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畜牧游牧及狩猎经济）而伴以相异的民族文化特点，多半是遵循与中原相抗衡进而融合的过程。历史上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强大到统治全中国的一部或全部，如辽、金、元、清诸朝都是如此。至于吐蕃、西夏、南诏等立国达数百年或上千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也是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的中外学者所着眼的重点课题。历来说论这些民族关系的著作，有些在微观的考证方面，十分精确，但在宏观的概括上都不是周衍和形成体系的，只有马先生的一系列著述：《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彝族古代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把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国家，从族属源流、社会政治制度、风习信仰、民族关系及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科学的历史的论述。作为体系地展现这一历史文化带的民族关系史，马先生是第一人。他常教导我们，研究学问要攻坚，他以“攻坚”的精神，克服了民族史研究上的一个个难点，建立起一块块丰碑。这是他为学术界建立的一大功勋。

马先生除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分热忱。不论是伊斯兰研究所（今中东研究所）的建立，还是